

把握好中山大学与各位人才事业发展的命运

——许宁生校长在 2013 年度中山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研讨会上的讲话

- 中大发展有两个关键瓶颈,都在人才方面,最主要就在研究人才方面。人才问题是学校最关注的,比钱重要,比学校的土地、用房重要。
- 人才要有胸怀
- 人才要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 人才要有团队精神

各位杰出青年,我已经接近老年,应该是“杰出中年”了,今天,重新回到这个群体来,感情还是相当不一样的。我曾经参加过第一届和后续若干届中青会议,后来没有参加,因为自己觉得太老,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面孔,想起当年,不堪回首。

首先,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会议,是学校的一个重要平台,我想各个部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平台再做大一些。我们把名称稍微改一下,把全校包括人文社科的以及不戴“杰青”帽子的人才一起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加进来。如何组织,希望多加研讨。学校需要这个平台,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和科技研究方面的对话机制。今天的会议组织得很好,把国家奖励办和省科技厅的领导请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感谢他们的机会。另外,我在这里感谢组织这次会议的各个单位,尤其要感谢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个单位,说明你们很重视我们这些青年,包括老的青年。我认为今天出席的各位学者代表了我们学校理工医管学科最活跃最强大的科技力量。中山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如果没有这些力量,学校的优势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任重道远,当然,对没有参加本次会议的各单位和部门,各位学者也应该尊重和感激他们。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把握好中山大学与各位人才事业发展的命运”。中山大学即将进入百年,弄清楚我们能做什么非常重要,因为从各国的大学的发展来看,百年是个坎。另外,现阶段恰逢是我校人才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刚才黎孟刚副校长罗列了

十几年来我们学校在科技和人才各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但是,为什么要在此强调各位人才的事业发展是关键呢,因为它制约着中山大学事业的发展。目前中大发展有两个关键瓶颈,都在人才方面,最主要就在研究人才方面:一个是青年这一块,我在这里不评述,另一个是现有人才下一步能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这两个问题是学校最关注的,比钱重要,比学校的土地、用房重要。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就是这个群体。为什么说各位人才事业发展与中大事业发展这两者有关系呢?中山大学的生命是无限的,而在座各位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个人有限的生命堆积成了中山大学无限的生命,中大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大家的贡献。先谈谈中大的发展阶段。近90年的发展全过程我们没有完全了解,但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大家比较清楚。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010年,是一个阶段,是我们快速发展、大力拓展、基础铺垫的阶段;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进入一个提高发展质量和增强特色的过程,得益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过程应关注的内涵和目标已经由模糊变清晰,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认识。

第一,我们统一认识,确定了学校战略定位以及发展目标。我们提出了要让学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及成为怎样的一流大学,并且有规划地推进落实,既有顶层设计,又有理念创新。这些经过了学校党代会确定,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学校制定了十二五规划和十年改革发展规划,规划的内容从原来的学科建设、校园建设逐步扩展到了人才、本科教学等。办学理念也逐步提升,我们坚持“教授就是大

学”、“善待学生”这两个理念,现在大家进一步达成共识,要推进“人心向学”,明确了学校核心工作定位,这样一来,针对教师、学生和学校核心工作这三个方面的理念形成了体系,得到了完善。

第二,学校在现代综合性大学学科基本框架建设取得重点突破。过去我们学校被称为文理见长的大学,后来有了医科,也很强,因此,应该改为以“文理医见长”。而现代化综合性大学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除了文理医,现代综合性大学还可以大力发展应用技术与工程学科。为什么说我校有了重点突破呢?在2012年教育部第三轮全国学科水平评估中,我校有3个学科进入前3,16个学科进入前5,32个学科进入前10,表明了学校总体实力居于国内高校前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清楚了学校在人文、经管、理学、医学四个学科群的厚实基础,看到了发展应用技术与工程学科领域的可行性,增强了学校建设以五大学科群为主要特色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的信心。过去对我校“综合性”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模糊,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以上述五大学科群作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另一方面,在我校学科的学术论文国际影响方面,根据ESI最新统计,截至2013年12月,我校在16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总被引次数进入全球前1%,位列国内高校第2位,7个学科进入全球前0.1-0.5%,排在国内高校第3位。这16个学科领域主要是交叉领域,这一结果让我们看到学校发展学科交叉融合建设是有很好的基础的。

第三,学校抓住机遇建设了若干重大工程与应

用技术科研平台和教育平台,为补上应用技术与工程学科短板奠定了初步基础。在科研平台方面,学校顺利完成承接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任务,“天河二号”入驻我校;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建设了转化医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在教育平台方面,建设了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和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等,为应用技术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学校在学科基本框架、重大工程与应用技术科研平台和教育平台建设取得的重点突破是后续学校特色建设的前提。学校后续要做好发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要基于“现代化综合性大学”这个特色,基础前沿交叉以及下一步对国家地区的科技贡献都应该从这里出发。可以看到,学校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特色和基础更清楚了,我们还可以看出,学校的“珠峰”在哪也逐步凸显,现在可以说呈现出“珠峰”初步端倪的已有“大生命学科领域”,由我们的生物与医学初步融合形成。只要抓住机会,在中山大学一百年时,学校的“珠峰”应该就比较明显了,在接下来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学校将更加依赖大家的努力,所以说把握好中山大学命运还是在座各位共同的责任。

再讲几点关于人才事业的。不管我们是谁,谁都要把握好自己事业的命运,中山大学的命运才有保障。有下面三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人才要有胸怀。你的事业理想有多大你就能做多大的事,各位的事业理想值得各位不断思考。胸怀还体现在对他人包容,要有海量;与此有关

的还有情商,这也是个人事业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中大人务实是优点,不想担当更大的事则是缺点,希望大家扬长避短。

第二,人才要有积极向上的的人生态度。在座的各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但各位是否还应该考虑: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你在干什么有分量的事情,将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什么;你在国家和国际上做了哪些推动学术和学科发展的大事,是否发挥着领军人物的作用。我们要在这些方面不断努力,一是在承担科研任务上,能在国家乃至国际层面逐步担当主角;二是在国家和国际上要有领头羊(引领)的学术地位;三是在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方面,要成为领军人物。

第三,人才要有团队精神。实际上在科研组织方面搞团队是中国的特色,有制度和文化的优势。中国是搞团队合作的好地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和”,要做好团队就需要发挥“和”这一文化优势。如果你是领军人物,要做到“和”,就要关心、支持、帮助下属;作为合作者,就要关心、尊重他人;作为年轻队员,就要支持、配合、尊重年长者包括领军人物。总的来说在一个团队里要相互尊重,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能否发挥中国特色,做大做好你的事业,跟没有发挥团队作用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与大家交流,首先是肯定、激励大家,我也从学校事业发展和个人事业发展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对大家既是提醒,也是关心,同时也是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你好我也好。谢谢大家!

教授治学

学术永远没有退休

“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这一点贯穿了我的一生,从来没有改变。”——哲学系 张华夏教授



当第一缕晨光爬上窗台,不少康园学子仍然贪眠不起时,80 高龄的张华夏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洗漱完毕,伏案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时而娴熟地使用笔记本电脑查阅文献,时而凝眉深思,时而奋笔疾书。右手一截铅笔,左手一杯香茗,天天如是,岁岁不改。

17 年间,退休后的张华夏教授依然坚持平均

一 治学经历

少年立志,初衷不改
“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张华夏从事学术研究栉风沐雨,逆水行舟,沉潜数十载,半生与“哲学”结缘,没想到这一段因缘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张华夏的父亲张启正是我校算天文系的首届毕业生,精通数学,逻辑整饬,尤其喜欢反复琢磨问题,向来被张华夏视为心中楷模。耳濡目染之下,张华夏从小对数学学兴盎然,中学时代更是擅数理而薄文史。然而,这么一个重理轻文的数理天才高考填报志愿时却做了一个让人哗然的决定:“弃理从文”,报考中大经济学系。

原来,张华夏从小学习就“不安份”,不肯满足于课堂上的一知半解,更不愿意亦步亦趋唯师是从,念中学时,当同龄人都在按部就班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时,早慧他便开始四处搜刮各种书籍,饕餮般阅读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了。机缘巧合,知识上“杂食”的张华夏接触到西方数理经济学,兴趣陡增。还没进中大修读经济学时便已在心中暗下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经济学体系。事与愿违,当时经济学领域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张华夏念兹在兹的西方数理经济学所占分量微乎其微。悔不当初的张华夏开始把目光投向哲学领域(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本科毕业后顺利入读复旦大学哲学系,投身典奥精妙的哲学研究,立志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解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日常生活中挥之弗去的问题。

求学路上中途易趣,无论是修习经济学抑或哲学,每一回张华夏初次接触某一学科时,他都毫不胆怯地着眼干于学术的高峰之巅,胸怀鸿鹄志,不安苟且心。

逆境治学,只争朝夕
“最痛心的不是抗拒,而是浪费了读书的大好时光。”

尽管本科期间的经济学课程让人不尽满意,张华夏

张华夏,1933 年生于广州。1950 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哲学专业,195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后,就职于武汉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历任哲学教研室主任。1977 年调入中山大学组建科学哲学学科点,1985 年晋升为教授,历任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直至 1996 年退休。1988—1990 年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从事访问研究,任该校资深研究员。在全国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兼任多项职务。

张华夏教授长期从事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早期工作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中期工作集中于科学哲学、自然哲学和系统哲学,后期工作集中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哲学。主持过多项国际、全国及省部级研究课题,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学术奖。已出版学术专著 14 部、译著 3 部,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大部分在退休之后完成。

每天八小时的学习,勤勉程度媲美年轻学子。对他来说,退休不是学术研究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崭新的起点,“退休后不问人间烟火,拂去遍身尘埃,反而落得耳根清静,更适合研究学问。”

苍苍岁月,生如扁舟而浮沉无度,在这样一个饮誉学界、桃李天下的老教授身上到底发生过怎样曲折跌宕的治学故事?且听张华夏教授娓娓道来。

依然勤勉用功,未曾颓然自弃,荒废正业。他养成了一套做卡片、做读书笔记、收集整理资料的学习方法,为日后的求学治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他说:“这套方法让我受益终身,以至于我后来每看一本书,就有厚厚一本读书笔记,积累整理出来就能出一本书。”

嗜书如命的张华夏甚至把父亲读书时用的数学教材(英语版的微积分标准教程)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供于案前,时时翻阅。在上海求学时,曾被查封的旧书店一度重新开放,获知消息后张华夏彻夜难眠,守着钟点,天刚蒙蒙亮便第一个跑进刚刚开门营业的旧书店,搜罗了一大批科学和哲学书,通宵达旦潜心研读。他一再强调:“年轻人读书不能局限在一两个领域内认死理,坐井观天太狭隘。譬如读文的,不妨读读数理方面的书籍。”这一观念张华夏本人笃行不二,贯穿了他整个治学生涯。夙发复旦大学哲学系时,他坚持修习物理课程,孜孜不倦。在他的出版物中还有像《自然科学史》(1985)、《系统科学导论》(2006)这样的偏重数理方面的著作。

回首前尘,张华夏深有感慨地说:“在哲学追求的道路路上我感到最为苦恼和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当时我所处的时代和我的境遇,根本不容许我如愿,让人身不由己。”张华夏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值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文革十年动荡,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学习时光被无休止的调任安排和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所磨蚀。时不我与,便只好借时如金,在时间的夹缝中踉跄求索。

毕业后,张华夏被分配到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任职。1964 年,正值“四清”至文革之间的大动荡,学校停课,代之以劳累繁重的体力活。张华夏便利用夜晚和周日的的时间,自学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教程。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天的劳动下来疲惫万分,依然坚持在大家倒头大睡时守着小油灯学习,长夜漫漫唯影相依,独书卷为伴。

最让张华夏引以为傲的是,在他被调到长沙担任工人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班主任期间,他仅凭自学的知识,就给学生上了高等数学、电工基础、逻辑代数 and 开关电路这些本来是电子工程专业出身的老师负责的课程,并

收获了很好的反响。

张华夏说:“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在追求知识、追求哲学方面我是不遗余力的。文革被批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批我不害怕,这没什么大不了。最痛心最要命的是学习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我要努力把时间追回来。”

学术永远没有退休
“把时间追回来”,开启学术研究的春天

恨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把时间追回来”,张华夏说到做到。

文革结束,春回大地。幸运地被调到中山大学组建科学哲学学科点、开一代之先的张华夏也随之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春天”。在摸索学科组建的过程中,从小修习俄语的他深刻地认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下决心从零开始学英语。彼时,张教授早登不惑之年,记忆力大不如前,高校学科建设刚刚复苏,百废待兴,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可谓忙得焦头烂额,他感慨道:“挤时间是最大的问题。”但他依然坚持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勉地勉修习英语。上世纪 80 年代末前往英国阿伯丁大学访问交流前,还专门跑到四川外国语学院“闭关苦练”。带着一口流利的口语赴英,带回不少国际前沿思想,张华夏就这样开启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他的重要著作《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1999 第一版,2010 修订版)主要依靠在英国收集的史料写成。

更让人敬佩的是,为了更好地与最前沿的学术研究衔接,张华夏在七十高龄时迎难而上,专门报了一个电脑班,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学习电脑。他说:“当时全班最老的学生就是我。我对那些开班的负责人说,‘一定要把我挤进去!’”只见他得意地拍了拍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说:“如今我最要感谢这个宝贝,它使我实时追踪到国际哲学发展前沿,尤其是我所关注的英美哲学,它能提供的论文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甚至比图书馆更多。”

张教授本可以在退休后不问世事,乐享天伦。但他拒绝以此作为借口停止在学术路途上求真的步伐,更不为过往成绩自满。他乐呵呵地说:“做学问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年纪大了演算能力和记忆力有所下降,但知识面拓宽了,理解力反而提高了。我退休了吗?我没有退休!”现在,张华夏依然坚持平均每天八小时学习,还练就了非凡“坐功”。一次他下午两点伏案学习,被一个问题卡住了,冥思苦想不得解,一晃上门清洁的工人到了,才猛然发现七点到了,自己一坐就是五个小时不动。

正是因为这股赤诚的热忱和非凡的魄力,张华夏退休后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多次声称退休使自己已的哲学研究进入了“第三个春天”:“退休后不问人间烟火,拂去遍身尘埃,反而落得耳根清静,更适合研究学问。”

二 治学理念
广纳百川重传统,脚踏实地谈创新

张华夏从英国阿伯丁大学访学归来,给国内学术界带回了不少国际最前沿的思想,诸如生命伦理、生态伦理、因果定律等等。他表示这次访学是自己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治学需得广纳九州百川,以汇江海之大,补给八方“活水”,以臻澄清之境。然而,以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跟踪前沿学术动态的同时,尊重传统的张华夏并不轻易摒弃旧识,趋之若鹜地求新尚奇。

聊起自己的辩证法思想时,张华夏笑称,辩证法思想在一种广义意义上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并认为不应因为理论的失败,便全盘否定一种思想。他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谈到剩余价值学说与阶级斗争理

论,这些马克思主义中的经典理论被后继学者一再地研究,并发展出众多衍生理论,各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对于张华夏而言,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唯有集百家之长,除各派之短,反复沉思,一步一个脚印地才能走出自己的一条创新的路子。

阅读中存疑,存疑处慎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受“百家争鸣”方针鼓动,二十出头、“乳臭未干”的张华夏便敢于以笔为戈,就产业结构问题和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经济学研究》上唇枪舌战,激烈辩论。学术自由带来的信念萌芽可窥一斑。尽管后来这一信念在学术界备受腥风逆流打击,张华夏从未将其背弃,依旧果敢地践行一生。

“当时课本上苏联那一套思想体系不能满足我对知识的要求”,上海求学转投哲学怀抱,究其原因,张华夏如是说:“在我读大学的年代,课本所教授的知识几乎全都照搬苏联模式,在这一套模式下,现实中有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希望建立一套清晰、逻辑一贯和内容丰富的、不同于苏联那一套的哲学体系。”存疑,无疑是张华夏哲学研究的一个起点。他建议青年学生读书应当学会在阅读中存疑,在存疑处尽量深掘:“这住住就是治学真正开始的地方。”张华夏以维特根斯坦、亨普尔等人哲学思想中的著名转向为例,谈到这些哲学大家尚且不畏惧在晚年时候推翻自己以前的理论,更鼓励年轻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他说:“我的本体论哲学从批判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开始,写了《实在与过程》(1995)一书,后来又改进自己的观点,承认过程与实在有同样的重要性,写了《系统观念与哲学探索》(2003)一书,这个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还会继续下去。阶段的研究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研究的过程是永恒的。”

“一揽子主义”:“求真”的内核驱动

众所周知,张华夏有一著名的“一揽子主义”理论。这一思想强调做学问要善于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要懂得触类旁通,广泛涉猎多个领域,哲学辩证法、数学方程式、经济学等等,尝试寻找不同领域间的联系,并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这住住是独特见解迸发的地方。这并不是鼓励年轻学者东搞搞西挪挪,以各种跨领域的噱头整出一盘乍看之下金玉满堂的“大杂烩”,关键还在于“求真”的内核驱动,张华夏坚定地说:“要么不解决,要么一揽子解决!”追求真理,不能抱守一个领域认死理,执着门户之见,得动用一切资源登堂入室。在他看来,术业或可兼擅,闻道不分先后:“一个人读书并不一定要限于专业,对什么感兴趣就去钻研,学科之间的边缘往往是问题最多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我的《道德哲学与经济学系统分析》(2010)就是在边缘上奋斗的结果”。

生命不息,求真不止

秉持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张华夏走出了自己严谨且颇有成就的治学之路。回溯他的治学生涯,从 1950 年踏入大学校门接触经济学开始,一直到退休后的今天,张华夏的学术研究从未中断,从经济学到哲学,从高数到物理化学,六十二年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游弋各学科领域。

半生执着为哲学,何故?“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这一点贯穿了我的一生,从来没有改变。”老先生双眉轻蹙,一字一顿、认真笃定地说。瞬间,我们感动无言。先生鬓角的白发在落日余辉中隐隐闪亮,双眸如泉水一般清亮,箭矢一般坚定。这一幕,将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

■ 采写/本报记者 张惠琳 吴柯璇